

让“中国式安全感”更坚实

何艳玲

近日,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,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。此举是依法清除侵蚀社会肌体的毒瘤,解决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;更深层的意义,则在于以集中行动检视治理短板、整合治理资源、完善治理机制,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夯实基础。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常态化,为什么还要再次开展专项斗争?从治理逻辑看,专项治理是在重大风险面前重组资源、压实责任、突破条块分割的一种组织方式。常态治理依靠稳定的部门设置、职责分工和工作程序,优势在于持续、规范、可预期。但一些犯罪活动跨地区实施、跨行业牟利,在线上线下相互策应,利用了部门、地区和监管制度之间的缝隙。专项斗争能够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,把分散力量组织起来,对突出问题集中研判、集中攻坚。

专项斗争的意义不能只用一年内查处多少案件、打掉多少组织来衡量。集中行动终有期限,治理责任始终存在。专项治理与常态治理不是相互替代,而应当以集中行动发现问题,以常态机制巩固成果。因此,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依法打击黑恶犯罪攻坚战,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。

从案件背后发现治理问题

黑恶势力并非突然出现。一些依靠暴力、威胁控制一方,一些披着企业、协会等合法外衣活动;有的把持基层事务、插手工程项目,有的控制市场渠道、实施强迫交易,还有的借助网络平台,以恶意曝光、信息骚扰、虚假投诉、网络围攻等方式实施“软暴力”。其形态虽更隐蔽,但攫取非法利益、形成非法控制、破坏公共秩序的实质没有改变。

黑恶势力的危害不只在于实施违法犯罪,还在于形成一套同公共权力、市场规则相对抗的非正式权力。有的以“解决问题”的面目出现,在正规金融服务不足处非法放贷,在纠纷化解不畅处暴力讨债,在行业规则不健全处垄断经营、强迫交易。治理既要清除非法组织,也要补上公共服务和制度供给的缺口。

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不能就案办案。对重大案件和典型案件,要同步形成案件清单、问题清单、整改清单,使案件办理成为推动治理改进的起点。

以协同治理破解风险交织

当前涉黑涉恶犯罪呈现明显跨界特征:线上组织、线

下实施,通过企业账户转移资金,利用行业关系掩盖行为,并同网络技术、非法金融、个人信息滥用等问题交织。风险由此在地域、行业和线上线下之间传导,治理难点已不只是查处单一违法行为,而是识别一条跨越多个领域的风险链条。

专项斗争要围绕线索受理、分析研判、案件办理、行业整治,明确不同主体职责,形成可追踪的责任链条。群众举报由谁受理、如何分流、多久反馈,发现监管漏洞由谁整改,都要有清晰规则。协同不只是“多个部门一起参加”,而是让信息汇聚、专业判断相互印证,案件查办与行业监管同步推进。对重大复杂案件,还要明确牵头主体、协作边界和反馈时限。

对跨地区案件,要完善线索移送、证据协查和联合处置;对利用网络平台实施的犯罪,要推动政法机关、网信部门、金融机构和平台企业依法协作;对黑恶势力渗透较深的行业,要及时排查同类风险。实践证明有效的会商研判、线索移交、联合处置机制,应明确启动条件和运行程序,沉淀为常态治理制度,使专项行动形成的合力不因行动结束而消散。

需要让社会动员成为稳定的风险发现机制,黑恶犯罪虽隐蔽,却并非无迹可寻。一个市场是否欺行霸市、一个村庄是否有人把持事务、一个社区是否反复发生滋扰,群众往往最早感知。有效动员首先要让群众相信问题会被认真对待,且不必承担额外风险。举报受理、线索保密、举报人保护、办理反馈缺一不可;不属于涉黑涉恶犯罪的线索,也应按性质转交有关部门,防止诉求空转。社会动员并非只是将群众作为线索来源,而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生产安全的过程。行业从业者、平台企业、社区组织各有信息优势,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,将分散的社会感知纳入规范渠道。这并不意味着将专业执法责任转移给群众,而是让群众反映切身感受和异常现象,专业部门依法研判处置,边界清晰、衔接顺畅,社会动员才能持续。每一次及时反馈,也是在积累制度信任。

从“一案一治”走向“一类一治”

同类案件反复发生,往往有共同的制度诱因:强迫交易可能与市场准入不透明、行业自治失灵有关,非法催收可能与债务处置渠道不畅有关,黑恶势力染指基层事务可能暴露权力监督和村务公开薄弱,网络“软暴力”则可能反映平台投诉、账号管理和权益救济机制不完善。

应建立从个案查办到类案治理的转化机制。典型案例办结后,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排查同类问题,提出整改

措施并评估效果。从个案到类案,实质是把执法司法实践中获得的问题知识转化为制度知识。“一案一治”解决具体问题,“一类一治”从个案提炼规律、形成普遍规则,才能把办案成果转化为行政监管和行业治理能力。“打伞破网”也要查清权力为何被非法利益俘获,并通过小微权力清单、事项公开、群众监督和责任追究规范权力运行。

专项斗争既要有有力打击,也要重建秩序。黑恶势力被打掉后,如果其非法占据的空间和领域无人接续,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理需求没有合法供给,新的非法力量仍可能乘虚而入。基层组织软弱的,要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公共服务;行业协会失灵的,要恢复服务、自律和协调功能;纠纷解决渠道不畅的,要提高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的便利性;市场秩序受损的,要为合法经营主体恢复公平稳定的环境。

黑恶势力留下的还可能是社会关系受损、群众互不信任、受害者不敢正常生活等后果。案件办结不等于秩序自动恢复,还要做好受害人救助、矛盾化解和社区关系修复,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。形成“案件查办—行业整改—组织修复—效果评估”的治理链条,由群众和市场主体评价秩序是否真正改善。案件处理是起点,不是终点。

以制度建设巩固治理成果

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必须保持高压震慑态势,坚持重拳出击、露头就打;同时严格依法办事,坚持实事求是,做到“是黑恶一个不漏、不是黑恶一个不凑”。依法严惩与依法保障并不矛盾。安全感既来自犯罪受到打击,也来自依法办事。

专项斗争成效不能仅以案件数量衡量,还要看群众反映问题是否便利,部门信息能否流动,行业漏洞是否修补,基层服务能否跟进,同类问题是否减少、相关机制能否持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专项斗争也是对治理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和制度学习:它使平时不易察觉的问题集中显现,也为调整制度提供现实依据。为期一年的专项斗争有时间边界,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没有终点。要将集中行动形成的政治势能转化为制度效能,将临时协同转化为稳定机制,让群众参与转化为常态化风险感知网络,把案件暴露的问题转化为改革任务,并在行动结束后持续复盘评估。归根到底,要让群众从秩序改善中感受到公平正义,让市场主体从规则稳定中形成发展预期。这样的转化越充分,扫黑除恶成果就越持久,中国式安全感就越坚实。

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)

树立正确政绩观,要牢牢把握三重维度:要坚持实践观点,把求真务实作为实现政绩的基本途径;要坚持群众观点,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;要坚持历史观点,把科学发展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,做到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、统筹兼顾。

把实事求是贯穿树立政绩的全过程

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、最核心的观点,科学回答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。遵循这一观点,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,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,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、以实干出政绩。

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、思想方法、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,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,尊重客观规律。一是坚持调查研究、科学决策。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,更没有决策权。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,深入基层一线摸清实情、找准症结、问计于民,使思路、举措和政策符合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。二是坚持久久为功,保持战略定力。政贵有恒,治须有常。为官一任,为政一时,既要锐意进取、与时俱进,又要保持工作连续性与稳定性。对经过实践检验、符合人民利益、契合发展规律的科学蓝图,要一棒接着一棒跑。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也是评判政绩的重要标尺。要坚持实践导向,坚决杜绝急功近利、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,坚决摒弃“形象工程”“政绩工程”。脱离实际、违背规律的盲目蛮干,不仅难以取得实效,还会留下包袱和隐患,损害群众利益,侵蚀党的执政根基。党员干部要自觉校正政绩观,以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,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反复检验的过硬业绩。

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

坚持实事求是,最终要回答“为了谁”这个根本问题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,是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遵循这一观点,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,必须站稳人民立场,将为民办事、为民造福作为根本价值追求与最大政绩。

我们党自成立以来,就把立党为公、为民造福镌刻在旗帜上,熔铸于血脉中。人民立场是我们党始终坚守的价值坐标。政绩之本,在于为民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: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”“共产党人必须牢记,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”。这些重要论述,深刻回答了“政绩为谁而树”的根本问题。党员干部必须站稳站稳人民立场,把实现人民利益、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,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。

政绩要经得起人民检验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,把是否符合人民根本利益,是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、是否得到人民真心认可,作为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与根本尺度。政绩好不好,群众最有发言权。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,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。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,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,聚焦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养老、生态环境等民生关切,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,把好事事实办到群众心坎上。为民造福的政绩,归根结底要在实践中生成、在人民中检验、在历史中沉淀。

以长远谋发展,让政绩经得起历史检验

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,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,必须尊重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,科学把握生产力评判标准,实现物质财富持续积累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。

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,是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。坚持高质量发展,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,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。人类社会发展史,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、新质生产力不断迭代旧质生产力的历史。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实现形式。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,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,改造传统产业、壮大新兴产业、布局未来产业,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效,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。

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,必须坚持辩证思维,统筹兼顾显绩与潜绩、局部与全局、当前与长远的关系,实现发展质量、发展效益与长远价值的有机统一。把握显绩与潜绩的关系,既要做强当前见效的显绩,又要做打基础、固根本、增后劲、利长远的潜绩,实现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。把握局部与全局的关系,坚持立足局部、胸怀全局,主动把地方发展、部门工作融入国家战略和发展全局,做到既为一域争光,又为全局添彩,实现局部与全局的协同并进。把握当前与长远的关系。坚持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,推动短期发展成效与长远发展目标有机衔接,实现当前与长远的一体贯通。

实绩好坏,自有实践检验;政绩优劣,贵在群众口碑;功过是非,自有历史评断。党员干部要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思想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责任担当,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过硬政绩。

(作者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)

青马在线

动画创作要走出“神话舒适区”

闫聪慧

近来,《八仙》《大圣归来》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等一系列脱胎于神话传说的动画电影持续点燃市场,国风美学与中式叙事俨然成为中国动画的主流路径。无需过多宣传,人物一出场便唤起国民记忆,中国动画似乎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坦途。

然而,当孙悟空在不同版本里反复“觉醒”,哪吒在多个故事中轮番“重生”,真正诞生于当下、完全脱胎于当代生活的原创动画IP,却屈指可数。有年轻观众发问:“除了神仙妖怪,我们还能看点啥?”看似一句玩笑,却点出了当下文艺创作的一块短板。

神话在古代之所以充满活力,是因为它回应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真实困惑。然而,今天的动画如果只从这些古老形象中反复取材,便等于用古人的幻想替代了我们对自己时代的观察与表达。

当下神话IP繁荣,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活态创造,而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文化资源开发。孙悟空、哪吒、白蛇等形象被从原本的文化语境中抽离,包装为可供反复开发的符号化商品。这种模式之所以流行,是因为它能降低市场推广成本——投资者无需从零建构情感认同,只需在已有的文化心理土壤上“播种”即可。这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,使整个产业习惯于在现成的文化记忆上反复加码。

这种路径有其市场合理性,但同样遮蔽了一个深层矛盾:我们借用古人的幻想来表达,却回避用今日之眼去发现和塑造新的现实。当行业把绝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少数传统IP上反复开采,现实主义、科幻、都市、体育等原创方向便得不到成长的养分。

为什么诞生于当代生活的原创动画IP如此难产?不能简单归咎于创作者不努力。在现有产业分工中,

大量动画劳动者被深度嵌入IP改编流水线,从建模、渲染到特效,技术层面日趋精良,叙事内核却日益趋同。创造性的精神劳动,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对已知符号的重新组装。创作者离自己的创造性本质越来越远,作品越是宏大精美,属于创作者自身的、对当下现实的鲜活感悟反而越稀薄。

当银幕上流行的前世今生、神魔大战,观众的审美经验被反复固化,动画本该是展现广阔世界的万花筒,如今却收窄了想象力的边界。

深厚的传统积淀是文化自信的基石,但它不能替代持续的原创造力。中国动画产业走向成熟,既要有能力反复激活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,更要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“新人物”,书写那些古老神话不曾触及、却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当代故事。

(作者单位为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)

从985到984.5:好大学不只有一个答案

刘伟

2026年高考录取落幕,一个现象引发关注:西湖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、深圳理工大学、福耀科技大学等建校不足十年、没有“985”头衔的新型研究型大学,在各省录取分数线超过老牌985,网友戏称其为“984.5大学”。调侃背后,一个深层问题浮出水面:当考生用分数重新排列大学座次时,究竟在丈量什么?

回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史,这一变化或可看得更清楚。

1978年,全国恢复高考。20世纪80年代,伴随改革开放与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论断的提出,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。1995年“211工程”启动,1998年“985工程”诞生——“985”不仅指代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一流大学的国家战略,也成为人们认定高水平大学的权威标识。这些标签迅速内化为社会识别大学质量的通行标尺。

此后二十余年,985高校积累了深厚的学科生态、学术底蕴与校友网络,成为难以复制的无形资本。但随着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,从“世界工厂”走向“创新高地”,产业结构加速向人工智能、半导体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迁。劳动力市场渴求具备交叉学科知识、前沿技术视野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“定制化”人才。

新型大学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获得认可,不仅因为“年轻”,更因为在办学模式上的探索。它们普遍以产业前沿需求为导向,设置交叉研究中心,模糊学科边界;让本科生从大一起进入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,形成“老师引领—项目驱动—平台支撑”的育人闭环。这种灵活、精准的“轻骑兵”模式,与当下产业升级对人才能力的即时需求形成共振。

然而,这一类大学的办学模式高度依赖地方政府与

社会资本的持续巨额投入,依赖小规模、高师生比的配置。它能否从“标杆”走向“可复制”,能否在更大范围内提升高等教育普惠质量,仍有待观察。新型大学像“轻骑兵”,灵活、精准、高效,但高等教育还需要“重装师”,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、人文社科的深层滋养、复杂社会问题的综合研判,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跨代传承。985高校积累的学科生态、学术底蕴、校友网络与社会声誉,仍是难以在短期内复制的无形资本。

从更深层次看,如果过度强调“产业绑定”与“成果转化”,大学可能成为“企业研发部”;如果以短期经济回报作为核心评价指标,基础研究的好奇心驱动可能被抑制,人文社科的空间可能被挤压,育人的主体价值可能被消解。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服务国家战略,在产业效率与育人长远性之间找到平衡。

【作者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(浙江行政学院)研究员】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|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|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